

觀察

每份一角五分

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逢星期六出版

第四期



第五卷

觀察通訊

社會出路與人類前途

生活與文化

李中巖

閩局將動(福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閻錫山治下的山西

觀察讀者投寄

透視川西平原的農村

觀察讀者投寄

與農地(成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浙大學生被捕詳記

觀察讀者投寄

(杭州通信)

週末欄

老成持重——英國政治風度

Kingsley Martin

文藝

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

宗白華

專論

評全國學生被捕事

張志讓

張羣訪日之行

方秋葦

改革幣制已屆成敗關頭

劉大中

外論選譯

被牽着線的獨立國——菲列賓

William Winter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九二號內一號
 電話：(02) 7432
 電報掛號：90027
 華北航空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訂閱價目
 三個月：掛號一元二角，平寄一元一角
 六個月：掛號二元二角，平寄二元一角
 一年：掛號四元，平寄三元八角
 香港：掛號四元五角，平寄四元三角
 澳門：掛號四元五角，平寄四元三角
 汕頭：掛號四元五角，平寄四元三角
 廈門：掛號四元五角，平寄四元三角
 國外：掛號五元五角，平寄五元三角
 郵資：半年美金二元，航空寄刊
 觀察合訂本：第一、二、三、四卷上下冊，每冊二元
 共計八冊，每冊二元
 郵包費：掛號每冊七角，平寄每冊四角

廣告價目
 封面：每行一百五十元
 封底：每行一百五十元
 普通：每行八十元
 通：每行五十元
 照碼：每行五十元
 退稿：不收郵費，先惠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票一角五分
 航空掛號：附郵票一角五分
 航空掛號：附郵票一角五分
 事後函索，不易查覆



七五事件的政治的·道

德的·法律的責任

侯庭督

七五事件調查報告書總算發表了，政府的處置辦法，迄未見諸明文。繼之而來的，却是傳作義自請處分，北平各人民團體聯電總統，謂七五事件罪在奸匪，不應處分軍警長官。生在這個「民主」的國度裏，就是啼吧也要講話了。

七五事件調查報告書，無論從文字裏，從筆調上，我們已經看出，很多都是勉強、掩飾的。無怪誓命調查的秦次長德純，受刺激回京後要辭職了。

關於七五事件的責任：

第一：我們要問教育部。教育部既公佈在平津辦臨中臨大，何以無準備？乃東北學生蜂擁而至，踴躍台，住城洞，無衣無食。東北學生經過共區時候，共產黨就說，如果政府不管你們，你們再回來。教育部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無異給共產黨送羣衆。據行政院李惟果秘書長向來京請願學生說，在立法院未審核預算前，行政院既已撥兩千四百萬，專爲救濟東北學生，這筆款子教育部何時領到的？交誰負責辦理？都該查個明白。教育部事前不備，事後派員赴平，向各方推卸責任。誰實爲之？孰令致之？七五事件，教育部該負大部份政治責任。

第二：丁履進參議員在北平參議會提出的一救濟東北來平學生緊急辦法案，我們實在不敢苟同。學生受軍訓，停發東北國立學校經費，這不是救濟東北學生而是摧殘東北教育。丁參議員應該知道，東北是思想鬥爭的劇烈的戰場，爭取青年之不懈，這種提案，是爲淵驅魚，把青年逼

到共區去。據說丁參議員在新聞界工作，七五事件發生後，大肆渲染，中傷東北學生，都出了參議員之手。若然，我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七五事件，丁參議員應負道德上全部責任。

第三：學生搗毀參議會，是一種暴動行爲，姑無論其爲何搗毀，軍警當局何以不在暴動行爲時，搜捕肇事的一反動份子，而在到了許宅以後，學生行將解散之際，開槍殺人？據日擊者說，學生在參議會時，憲兵十九團梅慶嵐團長被擊受傷，惟憲警附槍，大聲疾呼：「我寧肯被打死，也不准開槍。」陳繼承，白世維，趙昌言等人，較之梅團長慚愧無地矣。在任何場合，軍警對徒手舉衆開槍都是畏怯的表現。七五事件，陳繼承，白世維，趙昌言等，應負殺人的法律責任。

傅作義總司令上書自請處分，我們非常同情。以勇於負責的傅氏，這種表示，絕非枉祖部屬的姿態。西安事變蔣委員長回京後尚自請處分；以傅氏總縮軍北軍政，七五事件竟在北平發生，傅氏不能毫無責任。中央予傅氏以處分，也是給傅氏心靈上一個安慰。

至於北平各團體聯電總統爲肇事軍警長官緩頰，真有些莫名其妙。原電有云：「一軍警帶槍應付緊急局勢，藉以保護一百八十萬市民之安全及東交民巷中外觀瞻所繫之地區，實爲事理之當然。即因防止暴動而發生意外，在法律上並不負任何責任，此亦各國之通例。」各國火山噴火則有之，未聞有軍警大規模屠殺徒手學生之一通例。

八名東北學生靜悄悄的與世長辭了，十九名受傷的，也可能變成殘廢。他們度過了十四年孤臣孽子的生活，雖然逃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刀尖，終於在民主時代低下頭來。死者不能復生了，在東北三千萬人心中深深的留了一個烙印。

(編者按：立法委員侯庭督先生

投來此文，原冀在專論欄發表，因爲本期專論三篇均已編好，並且這三篇都有時間性，不能移刊下期，侯先生此文文字數比較短，所以移在讀者投書欄內刊出。

痛斥編者

編輯先生：讀貴刊四卷廿四期「觀察」第四卷報告書後，有涉及本人等的事。先生云：「又如同濟大學一寢室裏，倒有四人來訂閱四份『半價本』。照我們的意見，假如他們經濟寬裕，便應各訂普通本，假如經濟困難，便應四人合訂一份半價本。但是現在社會上有便宜貨便大家搗，既不尊重舉辦人的原意，也不顧到是否剝奪了別人的權利，這種情形都使我們傷心。」現在有幾點，我們不得不申辯的：

(一) 蓋先生不知同濟宿舍的情形，大的五六十人一間，小的也是十餘人一案，若在數十人共間的寢室，訂閱貴刊半價本四份而過份，殊使我們不解。假如某學校設備完善，每人住宿舍一間，且比鄰，而四位清寒同學訂四份，先生認爲合理。這種「契約求劍」的辦法，也難令人苟同。

(二) 「半價本」的目的，是便利窮困的同學，我們家鄉既在共區，經濟來源早斷，若先生硬以此剝奪我們的「權利」，也是貴刊創設「半價本」的初衷嗎？

(三) 我們竭力籌措訂閱，實因我們愛嗜貴刊，不但是按期瀏覽，而且極欲保留，或轉贈內地諸清寒的朋友。若說四人可以合訂共閱，那又何苦。同學處既可借閱普通本，閱覽室亦可以任情涉獵，先生何不說，窮人就該死，四人也不能合訂。

(四) 先生說「有便宜貨，便大家搗」，我們很客觀的講句，到底搗到多少便宜？當時普通訂戶有八折優待，且優先寄出，遺失後且可補寄，紙張好，印刷清楚，反過來說，「半價本」既無折扣，又須最後付郵，遺失後且「恕不補寄」。紙壞

，印刷模糊是事實，名爲半價，其實又佔到多少的「光」，「這個年頭，有良心的到底有多少」，若你們不按期寄出，而又聲明「遺失不補」，這問題就複雜了。我們之間就有人好兩期未收着，大概是「洪審有誤」吧！你們一定說這是「願賭者上鈎」，又那能怪我「姜子牙」？

上海的「廣告術」相當的發達，五光十色，離奇怪狀，豈能言喻。貴刊的「半價」一號召，也不過是離奇中更離奇的一個騙局而已。先生見到市上「買一件送一件」的「大犧牲」？這與「半價」，又有何區別呢？

總之，現在社會上唯窮人才「沒有一道理，罵窮人也最爲簡單，因既不希望從窮人身上賺錢，責罵自不必顧慮，也不必爲窮人打算，「媚富驕貧」，雖爲世人之常情，真不料我們觀察編輯先生也是如此，真使我們傷心！我們於悲憤之餘，不得不對編輯先生的「閉門造車」一信口雌黃的言論予以駁斥，若先生尚能顧及貴刊一向的信譽和立場，請賜予披露，公諸社會，讓大衆評量吧？不過，這也看先生的度量如何？也可以說是「嚴重的考驗」，唐突的地方，尚請海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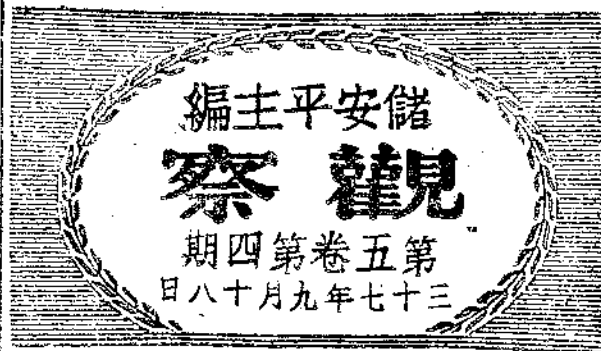
四半價本訂戶謹上於同濟大學
八月十日
寫好後，我們又不想寄，覺得未免給先生太窘了。今天想想，還是付郵的好，我們認爲辦報的人，也不能隨隨便便的斥責人家，因報紙的編輯也要有私德。

九月十日
(編者按：這四位半價定戶把編者罵得痛快之至。我對於這四位同學，能夠在氣憤之餘，寫了信而未立刻付郵，這種寬恕的風度，十分欽佩。他們的話說得有條有理。編者被罵得無地自容。我們希望這四位同學將來學校畢業後，也能鼓起熱情來爲社會服務，並有度量忍受社會的不公道的斥責。)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可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張志讓：復旦大學教授
 方秋華：亞洲世紀月刊主編
 劉大中：清華大學教授
 李中慶：前成都西南新聞日報主筆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評全國學生被捕事

張志讓

最近各地陸續有拘傳學生，偵查審判之事。始於北平南京，漸及上海以及其他各地。此事無論就國家、教育、社會或學生的立場來看，都是異常重大。社會人士，凡有所見，都應盡量發揮。筆者曾在北平、上海、及戰時西南大後方長期任教，所授學生甚多，得有好印象，今睹此重大事件發生，尤不能默爾無言！

一年餘來範圍較大的所謂學潮或學生運動，始於前年冬間的沈崇事件，終於今夏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事件。其中凡屬普遍性的事件，莫不瀰漫全國，且擴大至於社會各界。其僅於一校有關的事件，亦均引起全校性的行動表現。還在滬上及他地報紙均有記載，不難覆按。且政府既均一律稱之為「學潮」，則顧名思義，其均為多數人之集體行動，已不待言。如此廣大的運動，當然是大多數學生自發的活動，要說它是由少數人操縱，或為外力所利用，誰能相信！

況則判定一種集體行動確係由於少數人的操縱，亦並不因此就可斷定其為壞的行動，更不可因此就斷定其為違法行動。要評判每一學生運動的是非，必先就其主張與目的予以評判。如其主張與目的並非不對，則縱有少數人操縱其間，這運動仍舊是對的。而這少數人既非操縱任何不當之事，其操縱的行為亦即並無過失可言。所以我們如果對於學生運動，不問其主張之當否，一律冠以操縱利用之名，因而即斷為不當而且違法，這種邏輯決難成立。譬如孔子令「小子鳴鼓而攻之」是「即可謂孔子係在操縱其弟子，因而應受懲處」？又如一校少數學生提倡讀書運動，一呼百應，蔚成風氣，是否亦可謂其操縱多數學生，因而違法？再如三五信教學生，邀集多數同學，說教勸善，羣起信之，舉行禮拜，是否亦可謂其操縱多數學生，因而違法？利用或促進，其本身並無所「好」，其好壞完全要看其所提倡之事的正與否而定。

然政府對於學生運動則不然，向來僅有禁止、取締、或以實力制止的舉動，而很少對其主張正面的批判，即如沈崇事件，亦為一年餘以來最大的學潮。如這一學潮並無一言以論其主張之是非。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為學生最後一次的學潮，先不後，恰在此時大批逮捕學生。如這一學潮確有不當，則政府自應就其主張與目的指出其錯誤之處。而事實上則政府即至今日亦尚無一言及此。如此而欲入人於罪，其何足以服天下人之心！

政府如真確信某一學潮係由少數人操縱、煽惑、製造而成，多數人僅因受其欺騙而盲從，則消弭之法甚為簡易，祇須以真理對付枉理，以正論對付邪論，將少數人的欺騙揭穿，使多數人恍然大悟，其事即可立時平息。然政府從未從事於此。政府從不採取辯難與說服的方法，從不與學生講理。不講理而用力或者足以對付個人，但決不足以應付多數的學生。因為尋常不講理而用力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徒足以使對方疑我為理屈，反而益堅其自信之心。以此對付學潮，非但不能減少其羣衆，而反足以使其增加。試觀一年餘以來的學潮，參加的人數愈來愈多，即一可證，何況學校，無論公立私立，都是為國家教育青年而設，青年都是為受教而來。若對其行動主張之是非，始終不與講理，而最後遂欲入之於罪，如被人譴為不教而誅，又將何以自解？

最近各地逮捕學生，並非在學校多事之時，而却在平靜無事之日。此時大多數學生都因暑假回校，留校學生甚少。列名拘傳的學生當然多數散處各地，不在校內。何以逮捕之事，早不在暑假開始以前，尤其是學潮方盛之時舉行，遲不在學期開始，大多數學生回校之後舉行，而偏在此時舉行？究竟為何原因，自無從臆測，然却有一原因，顯然呈現於外，就是免激起多數學生的情感與行動。可是如果多數學生真是受了煽惑，則使其目睹少數煽惑之人就速，正是使其醒悟的最好方法。乃政府偏選擇多數學生不能目睹之時前往拘傳，顯然是為恐發生事端。由此長可知少數煽惑，多數盲從之說實難成立。

還有我們不應該忘却的，就是學生既為國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權，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按凡在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

一般國家之內，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皆應有不背此旨之法律，為其根據。行使此等權力，如無犯罪法條可據，固不合法，即有此種法條可據，亦尚須先開其內容是否不背憲法；如其內容與憲法保障人權之旨不合，則縱經立法機關通過，具有法律形式，亦仍必因其違憲而失去效力。這是一般行憲國家的原則。過去學潮或學生運動中一切共見共聞的行動與言論，未見有可適用「甚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之處；如將此條例解釋為可以適用，則非犯解釋錯誤之病，即該條例在這範圍之內，與保障人身自由之旨相背。

一般民主國家不僅認為審問處罰須有犯罪法條可據，且必須由有權審問處罰的機關為之。有權審訊處罰的機關就是法院。有些憲法且明白規定非法院不得審問處罰。再進一步研究：何謂法院？是否任何司法機關，只須稱之為「法院」，即可認為法院，還是必須是經常設置的法院，始可認為法院？王世杰先生於其所著「比較憲法」一書內有言云：「凡對任何犯罪案件或犯罪人，於法定審問處罰機關以外，設立臨時或特別法院，以行使審問處罰之權者，也構成侵犯人身自由的行為。各國憲法對於這種法院，亦往往以明文禁止。」云云。前立法院雖通過法律，設立特種刑事法庭，然其立法所據之憲法條文明明僅載：「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所謂「各級法院」當然係指法律編制中經常設置之各級法院。若對臨時事項設立臨時法院，自不在此條所

張羣訪日之行

方秋葦

前任行政院長張羣以私人資格，於八月廿一日離滬飛日訪問，九月十三日載興而歸。張氏此行，除其夫人外，另有外交部顧問邵毓麟。張氏行前聲明並無官方任何特殊使命，預計行程至多三週，即可遊遍日本。現統計張氏訪日時，計為二十三日，如非南京電催，尚擬赴南韓一行。誠如外報所說，「張羣此次訪日為麥克阿瑟元帥最珍視之上賓」，其與麥帥四次的會見，接踵而談，實為盟國任何政治家外交家訪日之外所未獲得的優遇。麥帥好友澳外長伊瓦特，在日所未得到的殊榮，張羣獲之；盟總從未予盟國政治家的特殊款待，張羣受之。日人對張羣的崇敬，日本政府對張羣的禮貌，更可以從他們一雙雙利的眼光看出。

張氏是載興歸來了。不用判斷而自知，張氏此次的觀察旅行，對麥帥、對日本、是印象良好，收穫豐富。今而後，他在國內政治上的聲望，將有新的增強，他對政府提供的日本問題意見，必將成為最權威的意見。我們正和多數的人羣一樣，以驚異的眼光，注視着張氏的飛去和他的飛來，不過心所謂危，不敢緘默，爰就張氏訪日之行，記述如左：

今天的日本，在麥帥的專斷管制之下，情勢是萬分微妙的。麥帥對於日本

定立法權範圍之內。以此審理學潮中的活動，亦與人身自由之保障不合。

人身自由之保障尚不僅要求逮捕、拘禁、審問、處罰。須由有權的機關為之，且尚要求須依法定程序為之。依法定程序，檢察官須「知有犯罪嫌疑」，始得「偵查犯人」，始得「傳喚被告」，如並未知有犯罪嫌疑，即不得簽發傳票。拘提被告，應用拘票，而拘票則非有拘提理由，不得簽發。若僅發傳票而未發拘票，即不得拘提。於傳票加書「隨時到案」而即實行拘提以去者，實屬於法無據。搜索應用搜索票，且搜索票必須載明應搜索之處所。各地當局應以上各種及其他法定程序之處頗多，亦係侵犯人權。

以上係從事實、道理、教育和法律的各種觀點，評論全國各地大批逮捕學生之事。據此論及一般愛護青年之意，筆者認為中央及各地有關機關應迅予恢復被捕學生自由，並使渠等完成其學業。

一面筆者對於各有關學校、法學家尤其是律師、社會人士、及政府，還有幾點希望。對有關學校言，希望各校當局以視學生如子弟的心情，盡一切可能的力量，設法恢復被捕學生的自由與學業。對於法學家尤其是律師，希望他們本其探求是非和重視公道之素志，為羣研究辯護之力。對於平時重視學生運動的社會各界人士，希望各盡心力，以求是非之得大白於天下。對於政府，希望細察社會各界為學生被捕而發生的各種呼聲，並勿以此各種呼聲為有罪。

——東亞的遠大抱負，早經浦立憲說得清楚。今年三月，麥帥致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書簡中說：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對世界政策的一環，援歐比援華為優先這事是不妥當的；因而麥帥強調：要實行中國國內的改革，必須先使其內戰停止。中國內戰如何停止呢？不待麥帥的說明，浦立憲周以德諸人已公開提出美國武力援華，以及麥帥為援華負責人的主張。據說這個建議深為美國共和黨若干權要同意，因而南京政界人士對於杜威即將上台後的「大東亞」形勢，閃爍着黃金似的希望。在這希望的影子下，陳立夫在美拜訪杜威，不謀而合的，這與張羣的訪日，自然會使人聯想着一幕雙管齊下的進行曲。

由於這些事象所包含的意義，中外對於張羣的訪日，發生了許多的揣測和謠傳。首先法國新聞社於八月十二日傳說張氏訪日的任務有三：（一）建立中日韓三國同盟；（二）與麥克阿瑟商討援華反共事宜，然後再與美國國務院商討具體步驟；（三）安排蔣蔣兩氏會晤事宜。這個傳說的可靠性如何，無人能加估量，而日本報紙的穿鑿附會，實在比法新社的報道有聲有色。日本報紙一口咬定張羣的訪日訪麥，是爲了中日韓聯盟而來。直到八月廿六日邵毓麟在東京發表談話承認，這一連串的謠傳纔暫時吹過。

常識令人瞭解若干的事物，一切事實的演變和發展，是有其來龍去脈的。

凡明悉日本現狀的人，皆知麥帥管制下的日本，是限制私人旅行的，凡無公務的外國人，無論在何種情形下不得在日本境內逗留，或自由旅行日本全境，即美國人亦不能例外。在此種封鎖和限制的情況下，張氏能以「私人資格」到日本作「觀察旅行」，不可謂非空前的破例。其次，張氏在國內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日本問題的理解，素為美日人士所熟知，日本人認為他是「蔣大總統的心腹」（東京時事新報），「最有資格交換中日友好意見之人士」（東洋經濟），並且張氏同麥帥的私誼甚篤，一九四五年張氏由美返國路過日本時，其受麥帥優厚的款待，三年未敢或忘，而麥帥在寂寞的客居中又無時不翹盼老友的重遊。澳外長伊瓦特多次的訪日，至少有一半的行程是接受麥帥邀約的。八月廿一日，張氏抵達東京羽田機場，當即發表聲明說：此行純係私人旅行，並感謝一九四五年由美返國過日時麥帥優厚的款待。足徵張氏私誼之厚，三年如一日。因而張氏在日所獲的「殊榮」，又豈偶然？想昔日張儀蘇秦遊說列國所得的款待，恐怕也不過如斯而已。

事實是在不偶然的情態下發展，一切的揣測和臆斷，並非無根之花。現在我們且看張氏在日廿三天「觀察旅行」的動態：

張氏一行三人是八月廿一日下午抵達東京的，除九月一日到大阪、京都、奈都等地遊覽五日外，在東京逗留的時間為最多。在東京，與麥帥有四次會見：第一次、時間為八月廿二日（星期日）、麥帥夫婦被例招待張氏，張並轉送蔣總統致麥帥私人函件。第二次、時間為八月卅一日，即張氏遊大阪行前之一日。本次會談歷二小時，內容未公佈，與張氏接近之人士仍一如半昔之保持緘默。第三次、時間為九月八日，會談兩小時半。張氏除與麥帥談及此次遊歷日本所得之各項印象外，並探討不能公開之問題。第四次、時間為九月十日，即返國前最後一次晤談，內容未公佈。

張氏與麥帥每作一次晤談，日本內閣總理廣田均（民主黨領袖）必訪張氏交換意見一次，對中日問題作深切的懇談。不僅廣田曾與張氏作多次晤談，即自由民主黨的幣原重喜郎、民主黨的大養健等國民協同黨幹事長三木武夫、社會黨幹事長片山哲等，先後與張氏作兩次以上的晤見。他如學院教授、退休的外交家如有田川越等，均被邀見。京都之游，與關西財界人物和美國第一軍團司令施溫作深切會談，意義更為重大。張氏在日除與盟總人員聯合國關係首腦部以及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之代表會見外，並多次出席「日華文化協會」「東邦研究會」和「日本文化界的招待會」，發表有關中日問題之演講，尤其臨行前在中國駐日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九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席上發表「告日本國民書」，並由日本廣播協會錄音，向日本全國轉播，甚為日人所重視。這篇演講並未對日本的「和平民主」現狀表示滿意，僅希望日人努力「思想革命」和「心理建設」，張氏最後強調三點：第一、日本的復興必須從經濟的和平民主化着手，中國輿論希望日本復興的計劃與努力，應該於戰前的錯誤與失敗的教訓；第二、日本的復興如無其他國家特別是近鄰的中國合作與援助

，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第三、關於中日兩國的未來關係，兩國人民都希望能夠從一個新的基礎出發，來樹立兩國的百年大計。中國對日決採不報復態度；日本則對華早日締結和約，深信中國亦必本其早日召開和會之一貫主張，繼續與有國家協議。據法新社的解釋，張氏這篇演講，對於日本和平民主之成功大為失望，因為若干黷武主義復活的事跡，說明日本如不經再教育的階段，很難真正步入和平民主的前程。假如法新社的解釋不差，張氏不應對日本失望，而應對麥帥失望！

日人對於張氏的重視，非自今天始；不過今天重視張氏之行，意義格外深切。自從南京發佈張氏訪日新聞後，日人即報以歡聲，發出許多評論，寄予無限的希望。八月十四日到九月一日，為日本報紙討論張氏訪日最高潮的時期，日本政府人物與張氏深入交換中日問題的意見，自八月廿五日下午張氏蒞田談話起，至栗栖越夫（經濟安定部長）九月九日訪張談日本經濟復興不威脅中國的問題止，其他很少產生「協調」或「一致」之見地，充分表現日人氣量的狹小，政府主持人的毫無政治家風度，斤斤計較現狀而不追求未來。我們局外人看得清楚，未知張氏有否警惕？

先看日本報紙的態度。日本報紙對於張氏訪日，最初確感惶惑與騷動，在張氏蒞田會談之後，居然裝起強硬的態度來。茲摘引各報社論如下：

「希望中國前行政院長張氏訪日之行，能有助於祛除中日間之誤解，尤其是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之恐懼心理。吾人自承對和平民主之努力，尚嫌不足，但日本人民對和平民主之熱忱，已為舉國一致之情緒。吾希望張氏探討日本經濟復興計劃，並不危害中國，而若干中國人士之誤解，似屬過慮。張氏對日本的認識甚為透關，渠可能使中國方面祛除對日之誤解。」（八月十四日東京世界日報社評）

「美國援日與援華有同等重要，中日經濟關係密切，應彼此呼應相通！蔣大總統的心腹、對日本有深切理解的張氏，近將訪日，目的在將日本的真實情形，向中國民眾傳達，以祛除中國若干人對日之恐懼，及美國對日政策意識的不安。」（八月十四日東京時事新報社評）

「中國目前所最恐懼者，為日本恢復遠東強國地位而威脅中國之安全，尤以美國援助日本，中國之變懼日甚。實則日本經濟之迅速復興，並不威脅中國。」（八月十六日東京新聞晚報社評）

「日華兩國現在正走着非常困難的路，貿易等交流固不必說，即使思想的交流也不能順利地實現。這樣，勢所必然地，我們對中國的關心每易成為稀薄，以致對於中國人對日本復興所抱的不安與誤解，也沒有特別去努力加以解消。……我們對張前院長的來訪特別期待着的，最重要的是能充分冷靜地認識日本的現實姿態與國際地位。如衆所知，中國對過去的敵國日本，也將容許其保有相當程度的工業水準。日本停戰未久，雖說已急

這地民主化了，在政治及經濟中，也還未把封建的成分完全清算，但是不信這事足以阻止我們走向民主主義。中國人所担心的「地下政府」業已組織之類，完全是由於誤解所造成。——如果日華兩國以友愛的精神，再度鞏固邦交，而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則在東亞也一定會造成永久的和平與安全。這樣說來，一切都應從日華兩國精神上的了解出發。張前院長對於日本現狀的指摘，我們願意告訴中國有識之士，我們自己對這點也將深自反省。」（九月一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評）

日本報紙一致不滿中國人民的「反扶日」，認為中國對日本復興恐懼與不安，係基於「誤解」「錯誤」，及「精神上的了解」不夠，祇要把這種心理祛除，互相從精神上的了解出發，纔能真正「以友愛的精神，再度鞏固邦交，而保障和平與安全。」這一幅面孔，忘去了自己是戰敗國投降國的身份，毫無懺悔，毫無良知，其氣量之狹小，睡骨之怨必報，躍然紙上。尤其無恥的，是大阪華僑創辦的「國際新聞」，八月廿四日社評竟指中國知識份子的「反美運動」，障蔽了中日邦交，並且是「對於現在最需要美援的中國，是非常可慮的現象」，同時「國際新聞」建議張羣與麥帥會商美國援助中國停止內戰的問題，因此「而可能使中日兩國人民回復為亞洲的盟邦，並為全亞洲的和平與福祉而築成中日合作的鞏固基礎。」這簡直不像中國人民應該說的話，而是日本反動派所說的話。

其次，再看日本政府當局的态度。現階段的日本政府，由保守勢力的政黨執政，廣田均即為保守勢力的中堅代表。八月廿五日張羣廣田會見時，張氏對於日本舊勢力之復活表示恐懼，廣田立即答覆此種舊勢力現已不復存在。廿八日張氏出席「日華文化協會」招待會，宣稱：「日本必須剷除其軍國主義，不僅思想必須革新，心理亦須改變，藉可成爲一和平民主的國家，否則則永不能獲得盟國之同情與合作。」九月三日到京都，同關西工業界談話，張氏發表相

同的見地。日本政府認爲張氏的「誤解」，故對張氏的談話並不表示滿意。九月初一日朝日新聞的社評，相當代表政府的意識。總之，日政府對張氏的訪日，初寄予無限的希望，後來這希望又漸趨衰薄，因爲張氏的日本觀並不完全符合廣田的理想。廣田同張羣雖然有相當的距離，片山同張羣的談話似乎較爲接近。實在說來，張羣這次所接觸的日本人士，多是保守勢力或財閥加緊的人物，份子複雜，水準不高。開明進步的人士，張氏未予接觸，甚至社會黨人派均未單獨接見，要之，同這一羣時代的冷薄談「和平民主建設」，當然是無從談起的。張羣應該感謝麥帥，因爲麥帥管轄下的「民主化日本」的政界人物，正是這一幅面貌。

那麼，張羣訪日究有什麼收穫呢？事實上，他可能滿載而歸的是：第一、麥帥這次對於張羣的來訪，的確報以無限好感，破例四次會見，在日人看來是無上光榮的。（裕仁晉見麥帥，三年來僅五六次）張羣致蔣總統私人函件一封，在禮貌上，麥帥可能以回函一件，請託張氏以私人資格轉達。第二、麥帥四次會談內容，自然無從估量，但張氏靈活活潑的運用，以及臨時的應變，可能對下列幾項問題表示關切：（一）日本現在儲備的過剩軍火，將作如何運用？或是否作爲「賠償物資」？（二）美國對日單獨媾和，中國將在什麼條件下對日媾和？（三）中國與美軍事與未來亞細亞形勢的關係；（四）中日經濟合作問題；特別是中日貿易如何圓滿的問題。這幾項問題的任何一樁，如果獲得解決，都是此行的收穫。如所週知，張羣這次的訪日，實是訪麥。張羣對於日本政府及各政黨是抱試探的態度，而其真正的任務，是對麥帥和未來美國的遠東政策，抱着黃金似的希望。這次的政治旅行，意義上是很大的，情緒上則是悲喜互見，矛盾交織着，因感着我們的政治家。我們且看張羣歸國後，除了向「中國政府提出完全及非常可靠之報告」（合衆社記）外，又將如何向中國人民交代此行的所見！

改革幣制已屆成敗關頭

劉大中

政府應立下決心去「停放封存」並應立即發行物價指數債券

幣制改革已經過了兩個星期，物價得到了暫時的穩定。但是在最近的三四天內，市面銀根鬆弛已經到了表面化的程度，物價已顯反漲趨勢。有許多物品已經漲到限價的水準；更有少數物品的價格，因爲政府禁止起過限價的登載，報紙只能用空格去代表。在這種險象叢生的狀態下，政府並沒有拿出我們一向所主張的「停放封存」辦法來；不但如此，政府反而在增資的辦法上，對行

改革幣制現在已到成敗的關頭。這次若再失敗，我們在文化界服務的寒士、一般公教人員、以及一切靠月薪度日的平民大眾，就要面臨絕境。對於這次改革法案的全盤檢討，筆者已在「新隆週刊」第十六期著文討論；鑒於現在形勢的危險，我們不能不就最主要的成敗關鍵，再作呼籲。

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以往十數日內暫時穩定的原因，及其不可靠性。第二節討論目前幣源之所在。在第三節中，我們把應付目前危險狀態的緊急

辦法，具體的提出來。

一 以往暫時的穩定及其不可靠性

過去十幾天中的小康局面，絕不容樂觀。實際上，這種暫時的穩定，完全是建築在下列三個脆弱的基礎上面；而在這幾天內，這三個基礎已顯出不穩的徵象：

(一)「警察力量」的震蕩：

在過去這十幾天內，政府對於基本的禍源不過加以皮毛的管制，反置全力於市場和限價的檢查和監督。這種發動軍警憲和特派「督導」大員到各處監督的辦法，我們統稱之為「警察力量」。凡是指望用「警察力量」去推行一種政策的，結果總難成功；對於經濟方面事情尤其如此。

在起初時，商人還摸不着頭緒，不敢妄動，政府的監察也特別嚴，所以一般物價都未超過限價。但是，銀根的鬆動和利率的降低是物價「看長」最可靠的信號，利之所在，商人們豈能經久按兵不動，這就是近幾天來報紙上「空格」物價出現的原因。超過限價的情形加多以後，政府有多少警察能去個別監督？

(二) 人民心理反應的影響：

金圓券的發行，正在物價急劇上增之後，人民望治心切，對於這一新耳目的新幣自然樂於接受。加以八月二十及二十一兩日銀錢美休，以及國家行局暫時停止貸款，銀根因之抽緊，物價得到幾天的平疲，人民隨時以現幣爭購物實，的風氣一時大鼓，現鈔流動的速率因而大減。

但是，人民多少年來被政府財政政策逼迫出來的爭購物實習慣，萬不是用一個類似「障眼法」的設施所能戒除的。報紙上「空格」物價增多以後，一般人民為保護他們辛苦所得的實值，就必又會使現鈔流通的速率加快起來。

(三) 國行收購金鈔價格的提高：

黃金美鈔（和後期中的銀元）的黑市價格，以往是物價激漲的先鋒。這一次改幣時所定的金鈔收購價格，一般的說，較當時的黑市價格為高，因此在頭幾天內，往國行兌換的人相當的踴躍，金鈔黑市因之沖滅。物價激勢中失去了這樣一個急先鋒，對於維持小康局面不無小補。但是，黃金美鈔是人民過去用來保護他們財富實值的工具之一。在報上「空格」價格越來越多的時候，金鈔黑市是否又會出現呢？是否已經出現呢？在當局施行「掛耳」政策之下，報紙不敢對金鈔黑市是否業已出現；但是當局自己心裏應當是明白的。

這三個脆弱的穩定基礎，受不住現實力量的沖擊，已顯搖搖欲墜之勢。這些力量來自何處，我們在下節中討論。

二 目前禍源之所在

戰事的繼續，自然是經濟不能穩定的基本原因。但是假如戰費能由賦稅收

入來支付，負擔落在有錢人的身上，價物並沒有上漲的必然性，至少不會像過去漲的那樣快。政府現時雖沒有足夠的勇氣和够高的行政效率去執行高度累進所得稅，但是對於增加稅收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明白的。根據過去的經驗，政府知道，在物價繼續漲的過程中，開支一天一天的與物價同比例增加，但是稅收却遠遠的落在後面（例如五月份應收的稅，到七月份才齊，已經值不到三分之一了）。這樣的下去，總有一天，稅收完全不值什麼，開支全靠發行；所以政府這次才有毅然改幣的決心。

這次政府改革幣制的基本理論是很簡單的。據王雲五氏估計，在幣制改革以後，政府的總支出約為三十六億金圓，稅收在按戰前標準調整以後約為二十五億，赤字約為十一億。出售美援物資應可抵補赤字的一半左右，所餘的數量不大，即或不能完全用公債去支付，困難也就不太嚴重。問題是：稅率按戰前標準調整後，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才能真正徵收到手的（兩個月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但是支出却不能等待。假如在調整稅收所需的期內，物價繼續增加，開支的數目也必與物價等比增加，一切豈不都成泡影？

在調整稅收所需的兩個月內，物價是否繼續增加，最主要的還是要看政府紙幣的發行，在同期內是否增加。這個問題的答案異常簡單：在稅收正在調整而未有增加以前，政府仍將依靠發行紙幣去應付支出，支出既不能改幣前減少，紙幣增發的速率自然也就與改幣前相同。不但如此，金、鈔、銀元的兌換，實際上使金圓券發行的增加速率，超過舊日法幣增發的速率以上。據政府自己說，法幣的發行總數用六千萬美元即可全部收回；而在改幣後的一週內，政府已兌入價值二千七百萬美元的金鈔銀元（中央社八月三十日電）；換言之，在這一週內，通貨的發行總數已因兌換金、鈔、銀元增加了幾將一半，因例行的收支不抵而增發的數量還並不在內，這是何等危險的事！在這樣紙幣增發的沖擊力量之下，上節中所說的那三個脆弱的穩定基礎，如何能鞏固得住？

三 緊急的應付辦法

在金圓券大量增發的沖擊之下，一般平民的經濟生命已如一髮千鈞，人民有權要求政府立即執行下列三種辦法，直到稅收能增加到預期中的數量時為止。其實，政府在發行金圓券之初，若能就這樣辦理，現時的情況當不至如此嚴重；當時未能這樣去作，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疏忽，都是人民所不能原宥的。

(甲) 停止全體行莊的放款，封凍所有存款。

任何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決定物價高低因素有下列四種：(一)紙幣發行的數量；(二)紙幣流通的速率；(三)銀錢業信用貸款的數量；(四)銀錢業信用貸款流通的速率。如上節所說，第一項現正在大量增加。對於第二項，任何人都沒有什麼辦法能去「管制」它。政府對於第一、二兩項既無控制的能力，若再不停止行莊放款和封凍存款，用以抵補第一項因素的增加，物價

如何會能不漲？這樣簡單的一個算術，還有人不懂麼？

尤其在政府現時極力抑低利率的政策下，行莊的放款對囤積商人已不啻是最大的引誘，何況各行莊還正在卑躬屈節，一反過去驕傲的態度，四下裏「哀求」商人動用一些款項呢？

放款停止後，存款必須加以封凍，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假設張三與某行莊很有交情，在某行莊帳上有一筆存款（實際上完全是某行莊本身的款項，或是與張三共有的）。這個行莊用張三的圖章簽發一張支票。注意，這在名義上是提取存款，而不是行莊放款；但是誰又知道這不是某行莊借與李四去購貨囤積的？

「停放封存」對於工商業自然是極「不方便」的。但是這正是壓迫奸商出圍的不二靈方。對於工業的正常需要，政府可用（乙）條辦法去應付。

（乙）恢復購貨貸款，同時嚴格檢查工廠倉庫：
現在上海倉庫的檢查，似還僅限於銀行倉庫和普通貨棧。這在第一次實行時，可能而確已有效。筆者風聞現在已有許多商人把存貨搬運到熟識的工廠裏

被牽着線的獨立國——菲列賓

Independence—With Strings The Nation, July 24, 1948

William Winter

七月四日菲列賓國開始它第三個艱苦的年頭，經濟和政治全都深深的繫住着美國。這個民國事實上並不是獨立的；它政治上的獨立是虛假的，因為它經濟上的獨立是不可能的。

兩年前這新國家誕生時，菲列賓的人民曾希望獲得全部主權，現在他們失望了。他們需要美國的援助，他們很明白援助背後有着牢籠他們的線，線牽在人家手上，獨立被扼住了。

當日本佔領菲島的時候，美國政府許諾「協助菲島恢復戰爭的破壞」，但是善後法案的六〇一款却有以下的規定：

「在兩國總統沒有簽定有關美菲商業的行政協定之前不得有五百元以上的交付。」

這規定的意義是說，在得到足以重建任何工廠或商店的特別貸款前，菲列賓的憲法必須加以修改，保證美國商人的特權，——就是和菲列賓人有同等的權利。因為美國總統祇能在菲列賓接受了被稱為 Bell Bill 的商業法案的規定之後才有權和菲列賓總統簽定行政協定。這法案又規定了必須有一部寫進菲列賓憲法之內才算有效；這規定是毫不

去了。政府自應同時檢查工廠內的存貨。對於工廠正當的資金需要，按下列原則由中央銀行直接貸款：

一、工廠存貨有限度者，不得申請貸款。

二、對於領到貸款的工廠，按下列方法辦理：
1. 恢復去年年底實行的購貨貸款；貸款到期時，由政府收購其成品，在市場上拋售。或：
2. 由工廠直接售與躉售商人，但須呈報所售數量及價值（同時由政府檢查該廠與該商之倉庫存貨），用為政府徵收該廠及該商營業稅及所得稅的參考。

（丙）發行物價指數債券：
為吸收行莊以外的遊資，政府應即發行物價指數債券。在改革幣制以後，發行物價指數債券之利是遠過於弊的。關於發行這種債券的辦法和益處，蔣碩傑和李崇淮先生等以前都曾著文詳細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三十七年九月六日於清華園

含糊的，商業法案中有下列的話：

「美國總統無權締結此種行政協定，除非非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去修改菲列賓憲法，使三四一款的規定成為菲列賓的法律。」

就是這樣，每個菲列賓人都看得到的。他們可能畏縮，抱怨這位有力的山姆大叔乘人之危；在許諾援助復興的時候並沒有這種有損菲列賓主權的提示。原來的諾言昭昭在入耳目，當它被短波無線電廣播到各地藏在屋頂、樹林、和巖穴裏的收音機時，菲列賓人民多麼高興。它曾振作抗日的士氣。現在，可是，援助是有條件的了。菲列賓人民可以發怒，堅持主權完整，不聽從華盛頓的命令起草他們的憲法，而美國的法律却是冷酷的，不遷就的。

Bell 商業法案第三四一款，就是要列入菲列賓憲法的那一款，規定了菲列賓人所謂「同等待遇」。大多數的美国人可能從沒有聽見過「同等待遇」的說法，更沒有念過 Bell 提案，但是在菲列賓民國的每一個地方都在研究這三百四十一款。這條款是這樣：

「菲列賓的農業、森林、公有地區的礦地、水利、礦產、煤、煤田及其他礦油，一切供給動力的來源

及其他自然資源，以及公共事業，如果開放給任何人去利用及開發時，必須同樣開放給美國公民及一切美國公民，直接或間接，所控制的各種企業公司。」

去年三月十一日是投票修改憲法的日期，看菲列賓人民是否接受美國國會的命令。在這日期之前的好幾個月，菲總統羅哈斯為了要履行「採取必要步驟去修改菲列賓憲法」，曾經從北部的呂宋島走到南部的明大南島，勸導他的人民接受「同等待遇」，而且向他們保證，雖則美國大企業家有此武斷的要求，但是對於美國友人是不必畏懼的。羅哈斯的演說是由一個美國海軍軍官起草、編輯、至少也是由他核准的。他的官職是美國駐菲大使館的新聞聯絡員。當時的美國大使是 McNutt，他讓這位軍官擔任這個職務，允許他住在總統府裏，使他常常在總統的左右。

像其他的美國記者一般，當時我曾設法向美國讀者報導這件事。但是沒有任何通訊社或是報紙願意發表我們的報導。美國記者聯合要求召回住在總統府裏的那位海軍軍官，但是這消息也沒有發表。也許在美國祇有少數大商人、大工業家和油商對此有興趣，菲列賓人却對他十分注意。我聽見有人稱他作「馬蘭蘭南（總統府的名稱）的拉耶

潘丁（帝俄時代的權臣），也有人稱他作「美國的山下」——山下奉文是日本的非列賓征服者。

不論怎樣，美國所指定的「同等待遇」的條款列入非列賓憲法裏了，從此美國工業可以拾取這特權的收益了。Westinghouse 擁有非列賓電工廠的大量股票，和製造燈泡的 Westinghouse 也已簽訂了建築水電廠的契約。Lever Brothers 已收買了馬尼刺肥皂精煉廠，非列賓是世界上最大的椰子產地之一，椰子油是肥皂的重要原料。Standard Oil 和 Socony-Vacuum 正在談判佔有 Cebu 島的油權。

非列賓對美國大企業的吸引力是很多的。首先是非列賓的稅率比美國低。公司稅在非列賓是百分之十二，在美國是百分之三十八。私人的所得稅，在非列賓是從百分之三起，到百分之六十，在美國是從百分之二十起，到百分之九十。一個已婚的男子還可以有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免稅額。

第二、工資成本較低。第三、因為靠近原料出產地，運輸費用可以減少。此外，非列賓還有大量美金存款，在目前兩國間輸入和輸出量差不多相抵。

美國資本高高興興的流到馬尼刺來，但非列賓人却高聲的反對。他們認為商業法案裏的規定是壓迫性的，非列賓在美國並不能享受同樣的權利，表示了他們的屈辱。而且美國每年祇准一百個非列賓人入境，而美國人來非列賓的每年却有一千二百個人可以作五年的居留，有五百個人可以永久居留。現在阻礙已經解除，美國投資者可以大搖大擺的跨過太平洋，而非列賓的經濟的依賴性也從此完成。

社會出路與人類前途

李中巖

時代的苦難愈來愈增大了，一個現代人身上所受的壓迫壓榨，也是愈來愈緊迫沉重。人類幾千年來歷史上殘餘下來的惡毒毒瘤，拖延累積到今天這一代人的身上來一個總爆發。現代人不僅身受了歷史上一切的折磨和苦難，而且我們承繼歷史下來的這條道路，也是已走到它的末途的了，這便是現代人的危機，這條道路不接得過去，不僅關係着這一代人的命運，而且關係着將來人類億萬代的命運。因此一個現代人面臨這時代的苦難、壓榨、和煎迫，不但不該逃避，而且不應叫苦，惟有運用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的智慧、沉毅、和理性，面迎這現實的困難去謀解

了。美國是他們最大的買客，工業的供給者，以及他們財富的蓄水池。非列賓的「巨案」官價值半個美金，實際上却祇值一角六分。

因為經濟上的依賴性，這個幼稚的民國小心地避免一切和華盛頓不合的外交政策。在重要的國際爭執上，我們可以包打非列賓是站在美國一面的。在舊金山會議時，我曾問過一位非列賓代表，為什麼他投票贊成一個他早先會表示反對過的案件。他很溫和的回答說：「這有什麼呢，美國國務院贊成這案件的。」我又問他：「是不是國務院要你贊成這案件的？」他說：「當然不是的。你們不相信我們知道我們的麵包是那一面擦上黃油的麼？」

在內政上非列賓的領袖們並不是永遠跟美國的暗示走的。例如，他們對於「非列賓」就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勝利之初，杜魯門總統召號審判和刑罰和日本合作的「國賊」。他的要求簡直是被忽視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國在 Leyte 登岸不久，第一次審判非列賓是在 Tacloban, Leyte 的首都。被審的是該省偽組織的省長。解放軍的省長是該省遊擊隊的領袖，他說如果把非列賓解放了，他的遊擊隊會找他算帳的。現在那位偽省長已經出獄，在家裏照舊的享受他沒有拘束的生活。名義上他是保釋的，但是他並不會再捉去審判了。新省長現在却已是國防部長。

非列賓的知識份子對於縱容非列賓的新態度大為不滿。但是這個國家需要經驗的領袖，而大部有能力的的人在戰時都和日本合作過的。而且非列賓的小農，他們佔着選民

決，別無他途！

當前的苦難正是人類的一大惡劫。我們國家，繼八年慘苦的戰爭後，又接上三年來的內戰，經濟的惡劣，已使絕對多數的人民瀕於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慘境境况；而人心思危，社會極其動盪不安，一切的倫理，秩序，和道義都快要蕩然無存了。社會的中樞神經已陷於癱瘓死醉狀態，社會也踏上支離破碎的解體局面。而腐化無能的政治，又正在不斷的製造罪惡，擴大和加重國人的苦痛。眼前這一切，無不徵兆着我們國家已邁向一個總奔潰的悲慘危局；我們再舉目看看世界，殺機充盈，正是密雲欲雨，陰霾滿天，散佈出濃烈的火藥臭味，世界的危機已成劍拔

的大部分，祇知道一些舊名字，選舉時就舉那些名字熟的人。新名字很不容易進入他們的耳朵。報紙銷路很小，收音機既貴又少。「與敵合作」是個新鮮的美國名字。他們是很容易忘記和原諒非列賓的。事實上確是如此，榮萊已被認為可能是下屆總統了！——這是日本所指定的總統，他會順從東京的訓令簽字在對美國的宣戰書上。

下屆選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舉行，非列賓的罪名將不被注意了。一般的興趣却集中在榮萊的第三黨。到現在榮萊還沒有加入自由黨或國民黨，但是他却已開始獲得美國的支持，因為他宣佈反共。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國會記錄裏有米里蘇他州的議員 Heald 說過下面一段話：

「很多有關榮萊的不正確和錯誤的報告曾流入美國。……共產主義的種子已播到全世界，非列賓也在裏面。……如果榮萊這樣能幹的領袖被棄置，真是對非列賓最大的損失。在最近的將來民主的公會需要一切有力量的朋友去打擊非列賓蔓延的共產勢力。」

榮萊是戰前有名的人物，現在如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即使不是官方的——兩個政黨都會拉攏他。自由黨的領袖，現任總統奎禮諾，已經和他有接洽，國民黨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榮萊至今還是超然兩黨，和朋友說他將從兩黨吸收選票，獨立競選。他可能會勝利的。

不論選舉的結果如何，官方對美國的態度是不會變的。如果榮萊當選，他向美宣戰的故事將被寬容，認為是被逼出此的；對於非列賓人民這種說法可以聽得進去的。

（觀察特約譯者譯）

響張，一觸即發之勢。人類前途，正是漆黑暗淡，未可樂觀。吾人週遭時刻皆感受著驚悸惶懼，更顯示眼前危機的迫切，有似於火之燃眉！

二

今日的危難，非僅乎少數國家；今日的痛苦亦非僅乎少數的個人。今日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一個不在這苦難的泥淖裏掙扎，世界上亦難找到一個人，確是平心靜氣，高枕無憂的。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人，皆有其衷心難言的痛苦和煩惱，不過各自的遭遇不同，等差有異而已，然皆不能免於此磨難人類的劫數。此一劫數之責任當縱追以往數千年歷史的人類生活及近代人的一切造作行為。人類幾千

年來對於「人生態度」一直是徘徊在迷離的歧途上，人與人關係，缺乏正確認識，彼此間相生相養之道，更是從來沒有好好弄過，大家在意識上先不清楚，對此也不重視，因而近代物質文明的社會中，人類是還依用着原始粗野橫暴的野性去發展。人類的「社會」雖已組成了幾千年，但人類對「社會生活」是還沒有真正知道過的。社會中的人羣，在「人生態度」上既是模糊不清，自不會有共同的信仰和認識的基礎，因而人類方寸間，難於得到協調一致而免不了矛盾叢生了。這種「內在的矛盾」發而為「外在的衝突」，所以全部人類歷史上充滿了芸芸眾生干戈擾攘的悲慘痛苦現象；而且在一個模糊的人生態度兼之充滿了矛盾下，一切的制度文化也形同虛懸而沒有基礎，其本身便先佔不穩，安能求其造福於人？所以制度文化常常被利用和製造了來做罪惡的幫兇，近代人的流血、犧牲、奮鬥、革命，幾乎全都是為着向制度文化掙扎而付出的。原是美滿幸福社會中的內容的制度文化，在今日社會裏，則只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今日人類的苦痛磨折，世界的危難不安，皆出於人類先對「人生態度」的沒有知識，再縱使制度文化的為禍。「制度文化」乃是在「人生態度」下的產物，追本溯源，當先對全部人生有重新檢討之需要。吾人欲解脫現代的苦難，創造未來人類永久幸福，不單該用力於制度文化的改變上，尤其該用力於人生邏輯以及支配人類生活的意識的改變上。今後人類有無前途，社會有無出路，當視人類對於「人生」有沒有一個澈底的醒悟和認識，是否建立得一個新的健全正確的「人生態度」，人類在「觀念上」「信仰上」能否求得共同的基礎，人與人間的關係，彼此相生相養之道，是否能得到一個合理的協調，此關係人類社會的命運，至大且巨，今後人類是合作互助以求共存，或是矛盾衝突以求共滅，這就是其分途舉路的重要關鍵了。

二
 覺醒過去，追求將來，重新建立健全正確的「人生態度」，乃是非常偉大而有利益的工作，只有從這條路線努力，才能替人類打出一塊新天地，帶來人類理想中的完美社會。筆者認為有幾點，是吾人作此偉大工作時，必須認識和看重的，茲提出於後：
 (一) 生存是目的 人是以「生存」為目的的，依此我們並不反對「人為生活而生活」。「創造事業」「服務天下」，是人生的目的，與「生存」「生活」之目的並行不悖。人類追求的目的既是生存，所以社會一定要「容一人生存，人與人間也要互「容」生存。這種「容」

乃是包括了自已的利害在內，因而其表現出來的精神，應該是「互助」與「合作」而不是「恩惠」與「施捨」。「生存」既是人類的目的，每個人必要去爭取，而適等取又必須是親自參加。大家的目的既一致，所有參加的力量自然可以匯合起來，便是「共謀生存」了。社會便是人類「共謀生存」的組織表現，因而如果社會中有人失掉了「生存」(被社會迫害而失掉了的)，或者「生存」受到了威脅，社會便失掉了它組織起來的意義。因此，個人要親自參加力量到社會去幫助「共謀生存」，而社會對個人則應絕對保障其「生存」。

(二) 個人是社會的「主」 人追求生存，全體人的目的一致後，便趨於結合力量以共謀生存，社會便是以實現共謀生存之目的而組織起來的。所以社會只是為達成人類求生存的工具，不過這工具是具永久性而已。社會好像是死的舞台，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好像舞台上裝添的死板的景片和道具，而全部舞台的靈魂、目的，及其所以能在人們心目中活起來，完全是靠了戲角的「存在」及其「表演」。人是社會的主人，也就是舞台上的戲角。在此，我們已明瞭社會是以人為「主」。至於社會上人羣的結合，原是基於共同的需要，立於平等的地位，所以人與人間，應該只有分工合作的事實，而無主從的關係。每一個人皆是社會的主人，而又立於平等的身份上相互合作。至於社會的文化制度，乃是人結合起來共謀生存的技巧，所以人實際是文化制度的主人而非其奴隸。因此，倘若任何文化制度，其表現出來的事實是阻礙和違反了「共謀生存」的目的，則人絕對有權更換和求改造這文化制度。(三) 人的覺醒便是社會出路 社會及其文化制度既是以人為「主」，則社會及其文化制度本無危害於人的可能，社會及其文化制度之所以危害及人，造成人類的痛苦，這是因為人放去了「主」的身份而縱容起它們來的，正是所謂「倒阿授柄」。因為這樣，所以原是能支配控制社會文化制度的「主」的人，現在反而站在社會文化制度面前戰戰兢兢，恐懼不安了。今後社會的出路，只有「一人」的自我覺醒，重新作社會及其文化制度的「主」。但我們要求這個覺醒是全體的人而不是部份的人，全體的人力量才是集中，「主」才作得了；而部份的人的覺醒，必然是與部份的不覺醒對立起來，力量不但不集中，而且是在互相矛盾抵銷，「主」便作不成，而只配兢兢業業的倒在社會和文化制度面前了。覺醒既然要靠全體的力量，則一社會中已覺醒的份子自然要幫助未覺醒者的力量，援一下手。這仍不是施恩，而是為了自己的利害；而未覺醒

者既不能離群離社會而另謀生存，自然便應該在環境劇變和別人援手下早覺醒過來，加入力量去共同爭取「主」的地位，否則不僅誤己而且誤人了！
 (四) 天下國家是人類永久幸福的基礎 其實「天下國家」與「國家」，甚而更小的社會組織，皆是人類因求「生存」的目的而後結合起來「共謀生存」的組織。人類既能因求「生存」之便，由散居村落而演變為部落和民族國家，當亦必能因求「生存」之便利及達成「共謀生存」而由國家演變到天下國家。其實人類早該進入天下國家的，只因爲犯了愚昧的自私偏狹的錯誤，看不得，想不開，而自困於民族國家的小小天地裏。一部世界史上，糾纏不清的戰亂痛苦，十九皆是由於這種愚昧造成的。今後人類要求得永久的和平幸福，唯有進入到天下國家的大天地裏去。天下國家既是為全體人類所共同需要，而其利害關係又是一致，所以其陣容應該包括全世界的人種民族在內。所以已經健全了的民族，應該援手於落在後面的其他民族，使大家能達成一個水準，這不僅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是天堂，要能大家挽手進去！

上列四點，筆者認為應是新的「人生態度」中的內容；在我人重新估價人生和準備將來時，是該予以參攷和重視的。今日人類還做着制度文化的奴隸，彼此間不相互「尊重」生存，也不互「容」生存，愚昧可憐的衝殺在自取狹小的天地裏以求共同毀滅，造成現世的許多悲慘痛苦。吾人必須於今日揭出「生存」之目的，以求人類的相「容」和相「安」於生存；大家要能重新再作社會和制度文化的「主人」；向一個更大的天地裏去「共謀生存」。必須有這樣的醒悟，必須有這樣的人生態度，人類共同來合作努力，當前的苦難始能排除消除，社會才能衝開死滅的封鎖，找到一條出路，人類也才能擺脫慘痛的壓迫，走上光明幸福的人生路道。

四
 如果我們不愚昧，不自欺欺人，我們就可以坦白承認，人類以往的和現在的痛苦煩惱，幾乎全是由於自己的招惹，自己把人間變成地獄而投身其中去受煎熬磨難。倘若現代人不有一翻猛然的覺悟，不能翻然改觀，另找出路，仍跌落在舊歷史的軌跡裏，人類不但繼續受苦，而且痛苦一定是愈演愈烈，愈往下愈悲慘，更不要說求解脫了。
 痛苦既然是人類自己去找尋來的，那麼當不會像「命定」那樣的悲觀和不可救藥了。只要人類肯付出真正的誠意求免彼此的痛苦，不再因循糊塗下(下接第十九面)

閩局將動

觀察讀者投寄

「急流勇退」

(觀察福州通信)

九月九日劉建緒主席突然發表一篇「治閩七年感想」的談話，在平靜的福建政壇投下一塊巨石。聲明中在略述福建七年來在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革兩方面的成就外，就說：

「中國社會問題複雜萬端，凡百改革，非可一蹴而就。本省以保農社為核心組織，使農民從組織中獲得增加生產與改善生活之力量，最後取得耕地所有權。所採路綫，實至正確。甚望全省人士合力推行，則農民多受一分實惠，地方即多得一分祥和，福建前途，或可賴以避險進入新紀元，保留幾分元氣，為復興建設之用。」

「國民勇於進取，人才尤衆，吾人每憶及鄭成功之開闢海疆，林則徐之焚禁鴉片，黃花崗諸先烈之慷慨赴義，輒不勝嚮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後繼者自有人在，特無由顯露耳。本人久已建議中央提

前完成地方自治，今年復再三表示選政地方之願望，深盼其在最近實現，俾今後省政更獲理想之進步。

「據昔沈文瀾蘇報而清漕厘，難民困，左文襄駐閩而設船廠，建海軍，二公遺澤至今猶存，我願學而未克焉。今主義未行，禍亂仍亟，本人既獻身黨國，無論何時何地，必貫徹其志，在革命戰線上，與福建同胞長為戰友。」

一位現任的主席，既未面對着強大的政敵和激烈的攻擊，又未獲得中央批准辭職，就發表這樣告別式的談話，這甚至引起了驚異。據說新聞處長李由農曾勸他收回談話稿，說：「簡直是臨別贈言呀！」劉的答覆是：「正是如此。我決心走了。」

於是省府機關報「福建時報」在同日刊出一篇「劉主席治閩七年」的社論，在歌頌之餘，即讚美劉氏的「急流勇退」。這四個字頗值得玩味。

劉建緒其人

劉建緒的生平，在國內許多讀者似熟悉而又不熟悉，因而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傳說，例如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裏說他是CC，有些小報又說他是政學系，其實都不是。他是夾縫裏鑽出來的人物，面面都很圓到。他是保定三期砲科畢業，與顧祝同白崇禧同期同學，北伐前是唐生智部下的團長，北伐時升任師長，克復漢陽有功，以後一帆風順，終於繼何健為四路軍總指揮，帶着湘軍出省追趕朱毛到滇康邊界，又折回浙東，在軍中場做了六年編將。福建主席的交換條件，便是把唐生智何健一脈相傳的四路軍交給中央。

初到閩時，福建的反響在各階層是頗不一致的。一般商民頗表歡迎，因為那時陳儀在福建正雷厲風行的統制經濟，尤其是專賣糧食的公法局和運挑担子也統制了的運輸公司，逼得老百姓跳河，陳嘉庚之警死反對陳儀，也是為此。劉到任後，首先除一舉手之勞，便已得了民心。但在上層階級心目中，劉的份量就遠不及陳儀。他們認為劉非中央嫡系，又是一個純粹的軍人，政治背景與政治手腕都不如陳。加以陳在福建是唯我獨尊，凡他不喜歡的聽處長，見了面連坐位都不讓的，而劉却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這在初期更啓了輕玩之心，而劉在人事上的應付，也就遠較陳為麻煩。

但只兩三年功夫，憑着他的虛心下氣，孜孜學習，劉在福建人印象中完全變了。講業務與法令，他比聽處長熟悉，講地方情況，他比市長清楚。從前演說要帶稿子，後來是滔滔不絕，一講幾個鐘頭，見解也頗超脫。例如他對「訓政」的看法就與別人不同，他說：「國父在建國大綱第八條中規定：『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及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既言協助人民，自以人民為主體，而政府所派人員只是去協助去指導，不是去代辦；上級政府更只負指導與考核的責任，不可侵越人民應有的權利。……國父遺囑中所謂『喚起民衆

「一語，我經過這幾年來實際工作的體驗，覺得所指的，主要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固非喚起民衆不能成功；而籌備地方自治的過程，實即喚起民衆的過程。」(見「從政檢討」續集)

劉之所以能如此進步，另一個原因是他肯自我檢討，甚至肯公開認錯。福建省政府差不多每年有一次政務巡察和行政會議，每半年有一次檢討會，每次劉都有一兩萬言的講評，指出各機關的缺點和錯誤，有時更展開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討論。這些講評輯成兩本「從政檢討」，其材料之豐富，內容之深刻，或在吳鼎昌的「花翎閉關」之鼎昌的「研究地方政治者是很可參攷的，但正因爲是一位省主席的演講集，反倒沒有人注意了。

基於他在政治上的認識，他也招攬了些人材，(但觀察四卷二十四期上一篇通信中所說的黎烈文王西彥却不是他延攬的，許欽文施登存更與他無干)試行了些改革，而陳儀手裏留下的人材和學校工廠地方，農民都懂得用團結的力量去爭取土地法給他們的權利。

但這種改良主義的辦法在現實中還是行不通，首先就是官僚政治的作祟。劉雖然年年檢討，年年批判，而結果只他個人和很少數的幹部有了進步，大多數仍是等因奉此一套。主管此事的地政局和社會處，又都是CC的專利品，他們的理論與劉更是兩樣。至於各縣縣長，有的連土地法都沒有見過，他們天天在應付土豪劣紳，有幾個想到農民呢？

即使沒有政治上的糾紛，劉的改良主義也是要碰釘子的，而在今年又黑潭潭殺出一個李

今年國大前後，各省都有自治的要求，而漸漸地都成了事實。劉記者執筆時爲止，長江以南各省，只粵桂閩台廣滇六省未動，台粵是去年才換的，桂廣滇都有其特殊性，於是實際上只有福建。以前福建人不大提閩人治閩的話，是因為提不出人來，但江西的胡家鳳發表之後，却給了福建很大的鼓勵。胡不過是廳長班子的人，他可做主席與胡同輩的楊維庵爲什麼不

改良主義的幻滅

大砲連謀

可以；如果楊綽綽有餘資格，則應與楊同等或資格高於他的就大有人在。於是閩人治閩之說也就被省參議會在四個月間側面提出來，質問省府爲什麼不多用本省人做縣長？言外之意已很明顯了，不過劉對參議會素來客氣，又無什麼弱點可以攻擊的，所以大家對劉本人還沒有什麼，而抓住前建甌縣長張之覺與議長馮兆岐的衝突案，大做文章。

正面攻擊劉的，却由素來不同福建的閩南籍立委連謙開砲。連是戴雨農的高級幹部，自派甚高，回閩後一連向劉推荐了八個縣長，那劉一個也不應酬。如以現任省府秘書長張翰儀老氣橫秋，各方都不滿意，中間又夾着CC與軍權之爭，於是連謙便獲得一部分黨案，曾於五月間由省參議會出委員出面，公請劉到議長丁超五公館吃飯，席間連謙本打算大放一砲的，但是丁超五和一部分省參議不以爲然，只得草草終場，幾句應酬話了事。連謙看見在福州放砲不方便，就到台灣上海南京去放，頗得一般閩人喝彩。但劉走了之後，繼任者是誰呢？這就意見分歧了，當

雞肋可棄

連謙最後提出張貞時，掌聲就稀稀落落下去。連謙從此變成了潮濕的爆竹。不過劉在這時却下了決心，他不動聲色地暗中托張羣程潛疏通，請求辭職，後來又托警務長唐繼向蔣總統密陳困難，都未獲准。於是劉便直接電請辭職了，在第二次辭呈延不批復之際，又發表這告別式的聲明。

和各省比較起來，福建的政治情勢單純得多，而劉和地方的感情也可說得上融洽。在連謙放砲之後，一部分閩籍立委且向中央慰留劉，中央也對他表示信任。所以劉的很多幹部頗想他再幹下去，福建的文化界更是如此。因爲劉對文化界和學生青年感情還好，同豐米店一案就是一例。今年六月福建學院學生和同豐米店吵架，被憲兵打傷兩個，事後保安司令部偏聽一面之詞，發表新聞，把責任完全推給學生，對學生挨打却一字不提，引起了學生的激憤。這件事平心說雙方都有點責任，而保安部的錯誤，不過是事前防範不周，事後配達新

聞失實而已，這在中國官場算不了一回事，劉却派省委陳培錕調解，除接受學生條件外，並登報三天向學生道歉，責備保安部不是，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省政府向學生道歉，在國內也是少見的。除了文化教育界以外，福州一般人民也不希望他走，因爲在他任內，福州年年有貧戶米吃。

可是劉却認爲反正這主席拖不好久，不如自動辭職，反來得漂亮。劉最感痛苦的是，因派別鬥爭使他不能推行自己的改良政策，又不能引用優秀的幹部。在他的地位，不能不面面敷衍，可是政治慾望是無窮的，面面敷衍，就面面不討好。劉個人實在厭於這種無謂的應酬和鬥爭。加以在財政上，閩省府收入不及紹興一縣，中央的補助又不痛快，近來薪水常常拖欠，辦公費每一單位只合得金圓五角。省主席在現行省制下除了替中央看守省政府以外，可說就是地方派系踢來踢去的皮球，都想利用的工具，都想爭奪的對象。劉氏實在管夠了雞肋的味道。

閩人治閩

在劉發表談話的第二天，省參議會即緊急集會，致電中央謂：「閩人治閩爲閩人一致要求，務請採納。」原來南京方面的消息是現任福州綏靖主任的湯恩伯會來，而湯在河南的聲名早把福建人嚇怕了。省參會這電報顯然

是搞架的。湯雖然做過陸軍副總，但還沒有當過省主席的味道，而福建目前要算好省份，所以活動甚力。除此以外，蔣鼎文曾任福建綏靖主任，朱紹良是在福州生長的，因此都是被揣測的對象。中央如在外省藉找繼任者，那末只有朱紹良可能爲福建接受。不過朱要降格做主席也許不願，除非兼個綏靖主任。那末又要添個福州綏署，問題就複雜了。

講到福建自己人，那就更複雜了。福建人東南西北的畛域分得很清楚，而閩南人與福州人尤其格格不入。在逐鹿者中閩西的賴連早有活動，可是他現在已出洋去了。閩北只有丁超五，年邁多病，不久以前又唱過「爲民請命」的高調，便有主席給他，也礙難接受，至於閩南和福州那就多了。福州久便來了閩變。閩變後陳儀幹了七年多，初期的整頓吏治，平靖地方，興辦學校工廠是很有成績的，後來却誤用統制經濟而失敗。劉的客觀條件不如陳，沒有財權也沒有人事權，自然建設不出什麼成績來，可是劉的風度開明，處事平穩，又遠非陳氏所及。他的幹部也沒有驕氣，不敢爲非作歹。所以福建這七年保安團隊從十一團減到五團，地方却相安無事。現在閩粵邊境已經報警，劉氏自己已做下去能否再保持現狀，已不易言。換一個人來，首先就要應付人事問題，什麼民主，什麼土地改革，恐怕都難免且鬧騰了。那時局面難免不亂。中央過去不准劉辭職者，大約

也是爲此。現在閩局已成必動之勢，爲了繼任者的決定，也許還要拖個把月。劉現在正做閩南人撤退的工作，省府因預算不敷，已決定各機關人員自請遣散者一律按年資發給遣散費，這就是爲閩南籍的小公務員們發旅費的意思。閩南籍的縣長也開始有兩個調省，而代以本縣人。新任者來了如何安插幹部就是大問題。福建人事制度頗嚴密，職員都有保障，非有過失不撤的。每個新任廳處長都只能帶一兩個秘書和庶務。現在閩南人騰出的缺因預算限制都不能再補，而留任的又不能隨便撤換。單是這個問題就會使新任棘手了。

(九月十日)

編後

這一期的四篇通信都是讀者投來的，這說明兩點：一、我們取稿向無成見，祇要稿子好，我們都採用；二、這期這四篇通信，每篇都很結實，這也可以說：一個刊物的內容，需要讀者共同支持，才能充實。所以我們以最大的誠意，希望各地讀者踴躍惠稿，共同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本刊每期的最後一次發稿時間是星期一上午，一切有時間性的文章，希望能在本週一期刊出者，均請設法使我們能在星期一上午收到。過了這個時間收到的稿子，就要擱到下星期的一期才能刊出了。

其實這個表還漏列了一些東西，比如除草施肥等工作和農忙期的肥料等項。因為這些工作大都是零散的或是由兒童勞動的，所以農民們多未列入。即使如此，而根據此表業已看出，十畝田的最低生產成本是白米三石三斗零，合黃穀七石五斗零，那麼辛苦經營的結果，農民除了租穀還得賠本的。

這差數如何抵補呢？這就只靠小春（冬季作物）了。然則小春的情形又怎樣呢？根據筆者就川西各縣三十六年冬季作物四種主要物產收穫量調查的結果如下：

以上田為標準，每畝最高產量是：菜子〇·五三七石，小麥〇·九五石，蠶豆〇·七九石，豌豆〇·五八石。

如以上田十畝分種這四種主要作物，最多可得：菜子一·三四三石，小麥二·三七五石，蠶豆一·九七五石，豌豆一·四五五石。又如以今春小春市價與米價為比例折合黃穀，可得黃穀一〇·七三七石，但生產成本最低數為四·三五石，故所餘僅足抵償大春之不足。結果一年辛苦，到頭來還是

四大皆空。何況還有種種攤派勒索苛捐雜稅等着他們要錢要米！今天的農民大眾，勞碌終年的結果，縱然想過牛馬般的價值免於餓斃凍死的生活都不容易，他們唯一的路，就是投靠高利貸者。這是飲鴆止渴，剝肉補瘡的辦法，可是他們為了求活，是忍痛地犧牲了。

乙、高利貸：農村高利貸是血淋淋的慘事，農民們的血汗被高利貸者輕易地吸取着，在這種物價飛騰的年度，有錢的人多不願放債，更助長了高利貸的氣焰，條件之苛，利率之高，名 稱 每畝稅率（白米老量）

巡查隊食米	〇·八升
軍服費	〇·三五升
子彈費	〇·七升
訓練費	〇·四五升
學米	〇·四五升
壯丁費	一·五升
戶籍米	〇·三升
供應米耗損	〇·五升
臨時費	〇·九升
總計	五·九五升

從上表可以看出，半年來每畝負擔老量米五升九合五，十畝當為五斗九升五合。但這個表尚有未全，如再加上臨時派工派款，人民負擔的苦重，是可以想像的。

丁、兵役和勞動力

真是嚇人聽聞，而且全以實物計算。有人為了春耕借債，借穀一石，收穫後還白米一石。有人在夏季青黃不接之際，借米兩斗半，還新穀一石。至於大六分大七分，的實物借貸利率，更為普遍。農民們為了使自己的妻兒免於餓死，不惜自投陷阱。

丙、稅捐：鄉村與城市是兩重天地，雖然最高當局三令五申嚴禁攤派人民苛捐雜稅，可是地方鄉鎮，陽奉陰違，這已是公開的祕密。茲就新都縣的××鄉為例，從本年初至六月底這半年來的稅捐攤派如下：

戊、農家收支：完糧是地主的負擔，但農民要負責務運送的責任，而且高斗冒括的損失，也被狹窄的地主轉嫁到他們的頭上。今天田賦之重，是盡人皆知。

完糧（本年標準）	九、一〇八石
雜捐攤派	五、四二石
小春成本	八、一五〇石
合計	三、八二四石

假如這是一個八口之家，那麼他們的最低生活費用當如下表：

項目	數量	折合黃穀
食鹽	六〇斤	一石
菜油	四八斤	一、二石
土布	每人每年一條	四石
棉花	每件	一石
其他必需費用	合計	四三石

這已是很可憐的最低生活費用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收支尚不能平衡。試把生產費用，捐稅和生活費用的支出相加，其總合為八〇、四二石，其赤字如下：收入：七一·三九石。支出：八〇·四二石。赤字：八·八五石。

這就是所謂自田自給的自耕農——農民中之比較富裕者的情形！至於佃農，更不用說！

的，中小地主已感無力的活屍隨地可見，學齡兒童為了工作而失學，農作常因人力缺乏而誤時，直接間接影響到收成。

一個上田二十畝的自耕農最高收入是大春黃穀五十石（老斗下同）小春折合黃穀二十石三斗九升，全年收入七十一石三斗九升。但他底生產成本和捐稅等項支出如下表：

數量（黃穀老斗）	九、一〇八石
五、四二石	
八、一五〇石	
三、八二四石	

並且這還是就豐收年而言，如遇災歉，其情況當更不堪設想。這便是四川的富庶區域——成都平原的農村底現實情況。至於邊區、丘陵地帶以及山地的情形，其農民的苦况，已非筆墨所能形容。所以以草根樹皮或獸骨土充饑和農民全家自殺的悲慘事實，今天常常充滿了報紙的新聞報導。

（上接十七頁）其餘知道的，還有一個姓彭的同學，廿一日外出未歸，可能失蹤，最近又傳來上期自治會理事張令督在家鄉溫州被捕的消息。

前兩天杭州特別庭又來傳訊兩位同學，一個是「三子三事件」時代表會主席，一個是已經開除的費雲驥報負責入劉萬甸，二人都未在校。

杭州在全國學生運動中，因為地位關係，實際上並不如平江滬之重要而發生作用，學校只有一個浙大可以動一動，但什麼「指揮東南學運的中心樞紐」云云，是否真是如此，恐怕當局自己心裏也知道，所以在歷次全國性的政治迫害中，杭州現得規模較小。但也正因此，當局要就不發動，一發動總是比旁的地方來得更可怕。大家不會健忘：還是和美國新聞處有關係的名記者楊濱是死在杭州，大學生于子三是被「玻璃自殺」在杭州，特務侵入學校毆打學生之風是開始於杭州，這次治安當局不通知學校竟大批軍警侵入自捕人也只有杭州才如此。正如京滬人對杭州的觀感，杭州是比較平

靜，但杭州確是更陰沉可怕的。「八廿二」的拘捕以後，浙大學生自治會一直在呼籲提高警覺，號召「保衛吳大信」，「不讓于子三慘案重演」他們的情緒是十分激動的。

一直到今天，各處的傳訊名單都已公佈，只有杭州的特別庭不把傳訊的姓名公諸報端。本來今天是清白不分，又加上被汪日章過去送交特別庭的所謂「黑名單」的「口供」，和青年軍學生羅振南「被毆」事件留下來的政治性的尾巴，甚至因為參加放生服務補習學校和求文院革新也可以被捕，這兩天又聽說有人在某地看見浙大二百五十六人的黑名單，於是許多人提防傳拘不知那天輪到自已頭上。在這次全國性大捕大傳訊學生中，杭州表面上最少，但在教育上造成的心理威脅却最大。校長說，學校無權要求特別庭公佈傳訊名單，而傳訊之權實在也不在特別庭而在省府，司法不獨立，更增加保障教育安全的困難，言之只有為中國教育的前途悲！

（九月九日）

× × ×

浙大學生被捕詳記

SY

(觀察杭州通信)

浙大在上學期「千子三事件」了了之後，整一個一學期對外算是沒有什麼糾紛，甚至捲全國的「反美扶日」愛國運動，也只在校內舉行過一些民意測驗、座談會、討論會和擴大舉行的「七七」紀念會之類，並沒有擴展到校外去。這是再上學期的「千子三事件」長時期地把同學們弄得身心疲勞之故。動極思靜，人之常情，這也足以證明學生運動是自發的，純潔的「絕對不是任何職業學生」所能煽動和操縱的。

但是，由於思想不自由，學術不獨立，即使是校內的糾紛，只要一方面有政治背景，外間的政治勢力，總要連繫着橫加干涉，不分皂白地給另一方戴上一頂紅帽子，也不問是非，校方便把學生們的合理要求一概抹殺，上學期末的「文院革新運動」和三位青年軍同志要向陸軍總部領手榴彈毀滅浙大」和私審同學引起公憤，發生衝突，他們勢孤，便勾結外力，

好幾天弄得浙大風聲鶴唳，寢食難安，完全陷於紛亂和恐怖狀態。結果，校方為息事寧人，硬開除了費登壁報負責人劉萬甸，被私審的同學倒受到兩個大過的分。兩次校內糾紛都是在外力壓迫下不了了之的，而「青年軍事件」，甚至所說其中一位自己用玻璃劃破了臉，還去法院告了一狀，告的又儘是有關「思想」和「反動言行」的罪名，至今還留下一條政治性的尾巴。

大考之前，聽說有人從某議長的公館看到杭州共四十二人的黑名單，捕法是在暑期中校外綁架，其中大多數當然是浙大學生。於是榜上有名的人，大家不聲不響，爲了避禍，大致一完便一走了之，一個也沒有留。暑假算是平靜的過了一個半月。這中間，純潔熱情的留校同學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開辦包括高中初中員工子弟小學和識字班，人數超過一千多；一件是動員了一百多人在赤日炎熱下辦理致生服務，解

決了從不同地方在不同時間到達的幾千個致生的住食問題，和其他有關升學考試的一切服務。前者得到校方的許可和贊助，後者曾收到致生上百封從各地來的感謝信，也幫助校方減少了許多麻煩，得到十分讚許。由於浙大同學「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吹吹噓噓的虛張聲勢，雖然做得相當圓滿，倒也沒有引起旁人過分的難耐。但暑期留校的小型自治會居然也表現了這麼高的組織能力和工作熱忱，於是自治會秘書厲熙暉被青年部杭州夏令會毆打的事件。

青年部夏令會設建國中學，據說是一個「輔導青年研究學術」的「學術機關」。負責人是一「藝術家」——「學者」的杭州國立藝專汪日章校長。不過這些受訓的校員，清一色的是京滬杭各大專學校的黨團員和教部保送入學也當然是黨團員的青年軍學生。這樣便似乎終有點給人特異之感。因爲上期南京爲「五二〇」紀念會後學生向青年部索

同被捕同學和浙大的「文院革新運動」，中央日報曾大辟疾呼「中國國民黨人苟稍有自尊感，稍有天賦自衛之本能，何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鬥爭」。中宣部發言人也公開號召國民黨團員與「職業學生」決一死戰。人們會從這方面去想，有的便仗心着下學期的學校將更多事

厲熙暉去建國中學招拂他剛畢業建中的妹妹和另一女同學到上海致大學，拿了東西剛走出大門，幾條彪形大漢迎面撞來喝問「是不是浙大學生」。厲答稱「是」。於是拳脚交加，拖入院內，許多人圍上來，吼着「打死他，打死他！」「浙大學生都是共匪！」但爲了要拷問「浙大共匪」活動情形，打得遍體鱗傷後，反綁兩臂，蒙着眼睛，由汪日章主任親自帶上樓去，審問中也不斷被周圍的大漢們連問帶打，問的是「浙大共匪活動的情形」，還寫好了一份「口供」逼着厲熙暉蓋手印。這樣的私刑

拷問竟發生在「輔導青年研究學術」的「學術機關」中，似乎難以令人置信。究竟厲熙暉只有一「浙大學生」的關係，平時在校內並不活動，同時因爲一位建國中學生的報信，這消息終於給浙大知道，全校大嘩，竺校長質問理由，汪日章說厲熙暉常去建中，這又看他們的壁報，有「刺探秘密」的嫌疑，並承認曾經拷問。竺校長說壁報本來給人看的，既是學術機關，便不應有所秘密。汪日章無法，終以「匪嫌」罪名送往警察分局，以後發次以「政治犯」，「匪犯」，等罪名層層轉送至警察總局，最後以「行跡可疑」，過了兩天一夜才被「保釋」出來。

暑期工作剛要順利束結，同學們正準備遊樂幾天的時候，各報先後公佈了「一年來學潮全面動態」，「共匪間諜煽惑學生製造學潮之鐵證」，和行政院「澈底肅清匪謀安定後方秩序」的命令，山雨欲來風滿樓，狂風過後，暴雨終於來了，北平南京的範圍沒自擴大，軍警勿勿撤出學校，登上四五輛卡車開走了。

這事過後，自治會開始營救工作，謁見竺校長。竺校長說前幾天教育部有命令到校，說軍警可以入校捕人，不准干涉並不准保釋，正準備商討應付辦法，不料竟突如其來，傳訊不經訊導處送訊，進入學校也不通知校方，是不合理的。

當天下午，施方二同學回來了，本來是「無罪保釋」，却也要「罪輕保釋」，據他們說，他們被問的是參加「五二〇」罷課沒有，參加「反對張其昀」的「文院革新運動」沒有？並問是那些人？因爲他們都沒有參加上述工作，才「具保釋回」。而吳大信則說「案情複雜」，收押入獄，當然是事實上說他參加致生服務和暑期補校工作，偵訊結果，又說得到他化名吳懷民和香港什麼人通的信，中間還提出一些假名字，說他定是這些人中間的「重要分子」，現在特刑庭已經正式起訴，看樣子即將審訊，並依此定讞。先抓人後找「證據」，且要根據此「證據」判罪，這或許就是今天「特種刑庭」之所以爲特種的「刑庭罷」。(下接十六頁)

回被捕同學和浙大的「文院革新運動」，中央日報曾大辟疾呼「中國國民黨人苟稍有自尊感，稍有天賦自衛之本能，何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鬥爭」。中宣部發言人也公開號召國民黨團員與「職業學生」決一死戰。人們會從這方面去想，有的便仗心着下學期的學校將更多事

厲熙暉去建國中學招拂他剛畢業建中的妹妹和另一女同學到上海致大學，拿了東西剛走出大門，幾條彪形大漢迎面撞來喝問「是不是浙大學生」。厲答稱「是」。於是拳脚交加，拖入院內，許多人圍上來，吼着「打死他，打死他！」「浙大學生都是共匪！」但爲了要拷問「浙大共匪」活動情形，打得遍體鱗傷後，反綁兩臂，蒙着眼睛，由汪日章主任親自帶上樓去，審問中也不斷被周圍的大漢們連問帶打，問的是「浙大共匪活動的情形」，還寫好了一份「口供」逼着厲熙暉蓋手印。這樣的私刑

拷問竟發生在「輔導青年研究學術」的「學術機關」中，似乎難以令人置信。究竟厲熙暉只有一「浙大學生」的關係，平時在校內並不活動，同時因爲一位建國中學生的報信，這消息終於給浙大知道，全校大嘩，竺校長質問理由，汪日章說厲熙暉常去建中，這又看他們的壁報，有「刺探秘密」的嫌疑，並承認曾經拷問。竺校長說壁報本來給人看的，既是學術機關，便不應有所秘密。汪日章無法，終以「匪嫌」罪名送往警察分局，以後發次以「政治犯」，「匪犯」，等罪名層層轉送至警察總局，最後以「行跡可疑」，過了兩天一夜才被「保釋」出來。

暑期工作剛要順利束結，同學們正準備遊樂幾天的時候，各報先後公佈了「一年來學潮全面動態」，「共匪間諜煽惑學生製造學潮之鐵證」，和行政院「澈底肅清匪謀安定後方秩序」的命令，山雨欲來風滿樓，狂風過後，暴雨終於來了，北平南京的範圍沒自擴大，軍警勿勿撤出學校，登上四五輛卡車開走了。

這事過後，自治會

週末
欄

老成重持——英國政治風度

Kingsley Martin

在 Court 的客廳裏，勞合喬治曾贊我以英國政治演說家的妙評。他說：「這是溫斯頓（邱吉爾），下院成了戲院。你引頸而聽；佳句如珠玉般從嘴角下滾。多完全的藝術！多渾熟的光芒！你會向自己說，沒有別人會想得這種意象，這種富麗的文采。太好了。於是他坐下了。幕落下，戲演過。你歡呼。但是你卻沒有被他的話所說服。飽滿溫却不然。每一句話他所說的全是平淡無奇。沒有名言，沒有諷刺，沒有警句。慢慢的，穩穩的說着平凡的話。但是他却近人。當他說完了，你和他同意。」

我常思索這段話。似乎可以解釋爲什麼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這一段期間當首相的不是邱吉爾，不是勞合喬治，而是飽爾溫。祇有在危急的戰爭年頭，國家纔需要勞合喬治和邱吉爾所有的才能。這兩個叱咤風雲的人物所缺的，邱吉爾雖有如許的年齡和功績還是缺的，是羅馬人所謂 Gravitas，我們可以譯作「持重」。

在英國，和古羅馬一般，持重和伶俐是不常在一起的。我不願說聰明人永遠沈不住氣；老成可以持重，修養可以克服輕佻（蕭伯納謹慎着這危險。）而且，才能是變易的。我想到克里浦斯，他的精神、虔誠、和正直最後贏得了無可動搖的地位，不多年前，當可記得，多少人曾貶損他是個伶俐和危險的書生，現在想來，未免可怪了。

有一種困難普通人不能克服的就是要成一個善於談話的人。談話、談話，會把一個意念秀麗的刻畫出來——這些會使朋友們喜歡他，但是這些也必然奪去他的持重。對一個問題面面都考慮到的能力，固然是有創造性的思想所必需的，但是對於政治家却是致命的。貝爾福（Balfour），他的才智出人肩頭，正是個典型；他從不能說出權威性的話，因為他的敏銳和平衡滋長了猶豫，不是堅定。Walter Elliot 屬於當今最會談話的人物，但是他保守黨的高級幹部裏還是見得伶俐有餘，持重不足。在這類事情上，英國的政治素質是移動得很慢的。當少年的狄斯累利（Disraeli）初入下院，充分準備好了，登壇發表的處女演說，原想一鳴驚人，結果却贏得滿堂輕侮的笑聲，當時看來此公的政治生涯將從此斷送了。他灰心之餘去請教一位聰明的朋友，這位朋友和他說，他如果想像復令響，祇有裝得相當的遲鈍。狄斯累利領會了，抑制了他豐沃的才華，慢慢的，他捨脫了怪癖的談話，維護他的天

才在演說裏流露出他非常的作用，終於壓倒爾爾。但是在他的首相和封侯之前，還夠上「持重」兩字。另一方面，格蘭斯東（Gladstone，狄氏的政治對手）却莊嚴、毅強，有時在演說裏却含糊到無法明白，即在他二十年華，已經宛如老成的重臣了。

如果你想在政治裏出頭，你最好把你的聰明藏在極底。我們這一代沒有比凱恩斯公爵（Lord Keynes）更聰明了；我平生所見人物中沒有遇到過像他一樣具有敏捷而完善的頭腦的。他在經濟學、文學和藝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在一生中曾到過被經濟學家所譏笑的意念終於變成了英美官方的常識。但是他在政治場合裏始終沒有成功過。他不但不是個有成就的政治家，甚至不是個有成就的談判使者，原因是在他的思想太快，他的優越感太顯著。像許多思想家一般，當他辯到對方沒有話時，他覺得勝利了。他永遠沒有學得勞合喬治所說政治辯論要能說得服人。

普通陪審官方算成功的格首。他能在一羣英美的商人面前娓娓說理，沒有半點漏洞，會議在表面的一致上結束了。但是他聽衆裏重要的人物，腦子固然大靈活，但是却坐在權力的位置裏，一路走回來，凱恩斯的實力喪失了作用。「這傢伙」，他們會說，「太聰明了。他在想我們的花樣，轉我們的念頭。我想不出怎樣回答他，但是我一直知道他是不對勁的」。英國美債的條件就是美國商人給凱恩斯爵士的答覆。

口才伶俐祇能說得人家啞口無言；持重却改變人家的成見，所謂心誠悅服。叫你辯論時聽人一着的並不是個壞教師。你得避免那跟在光芒背後的嫉妒；你的對手，在辯過了時時覺得高興，更在看到你不如他的羣衆給他的歡呼裏得到溫暖，一陣過後，會引起內疚；聽衆回來想想，也會覺得對你不起。很多政治上的勝利是從謙虛得來，甚至更從謙虛得來的。

英國政治裏持重的素質，在 Lytton Strachey 所著戈登將軍傳裏有關 Lord Haington 的話中，有過很好的描寫。傳見 Eminent Victorians 一書：「有過很好的描寫。傳見 Eminent Victorians 一書：「有過很好的描寫。傳見 Eminent Victorians 一書：」

在公務上，在私事裏也差不多，哈丁頓爵士的決定是有非常的重量。不論上下，英國人民對他有一致的尊重；這裏是一個可靠的人。他的性格確是他本國人所喜歡的。他不單是誠實；他的誠實是英國式的誠實——這種誠實是很自然的屬於一個活潑的標本，一

個英國人應當是這樣的標本。他們從哈丁頓爵士身上看到最近於他們所心愛的素質——公平踏實，富於常識——這些是他們一直希望用來表現自己的素質；他們自己即使有短處，不要緊，這裏還有個哈丁頓爵士，他是從不自私的，他是從不緊張的，他也從沒有幻想的。他們所知道的哈丁頓爵士剛好合在這格局裏，加上的是他們的愛慕和尊敬。他的喜歡野外運動給他們安全之感。他們愛他因為他不在乎。他們愛他因為他厭惡纖弱的傷感。最重要的，他們愛他因為他是全可靠的。他們最大的安慰是哈丁頓爵士在這方面是完不會弄花巧，不會給人驚異，不會惹人注目，也不會顯得高深莫測。他們坐着，聽他的演說，他不激動人的平舖直敘，平穩穩健；無限的單調所包圍，所支持下，聽衆感到他們的信賴最後得到了保障。

如果這些是在舊有政黨中產生信任的素質，在工黨的羣衆裏發生重量的條件並沒多大差異。我們聽見過多少次工黨演說家在充滿革命情緒的羣衆前，用着熱情和散亂的長篇大論贏得聽衆狂熱的歡呼！我們又看見過多少次那些端莊、遲鈍和有名的人物爲羣衆所愛好，爲的是他從不說一句出於意料的話，爲了他從小到老，四十多年，老是在運動裏；他用了最無聊的話來答覆質問，而得到絕大多數的擁護擊敗他強硬的對手！這裏的持重是否祇是指正統派選票的支持？有時，無疑的這是一種秘密。但是用這說法去看像 Arthur Henderson 那種老大哥式工黨人物，他未免是膚淺的批評，低估了他的領袖影響。至於貝文的記錄和政策，意見又大有出入。他的聲勢的確有他手創的運輸工會的支持。但是沒有一個人，看到這粗大的身材直立在工黨會議的講壇上，會懷疑他的地位大部是得之於羣衆的觀感，和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對於哈丁頓爵士的觀感是相似的。他代表了十足的英國工會主義的利益和成見。正和可以保證哈丁頓爵士會說出有關財產及愛爾蘭問題大家預料得到的話一般，貝文，不論他怎樣做，講到貴族、寒人、和效忠工黨運動時，他總是代表着勞動階級的正統派。這裏我們確着了這羣的根源了。政治根據共同利益、成見和財產地位把人民結集成團體，向着這無底的和無定形的成見和傳統所凝結成的膠體，那些尖銳的筆頭，政論家和叛徒們白的投射他們諷刺和爭辯的小爆竹。但是發醉的過程已經開始，社會上各種力量的平衡變動了，具有不同利益和成見的團體一旦出現，有辨別力的歷史家會看到昨天的異端已是今天的老生長談。在當前平凡裏的持重者正在引用資本論的話，不再提到韋伯或是 Kipling 了。

（譯自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August 21, 1948）

（譯自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August 21, 1948）



略談敦煌藝術的

意義與價值 宗白華

中國藝術有三個方向與境界：第一個是禮教的，倫理的方向。三代鐘鼎和玉器都產生於禮教，而它的圖案畫發展為具有教育及道德意義的漢代壁畫，（如武梁祠壁畫等），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也還是屬於這範疇。第二是唐宋以來篤愛自然界的山水花鳥，使中國繪畫樹立了他的特色，獲得了世界地位。然而正因為這「自然主義」支配了宋代的藝壇，遂使人們忘懷了那第三個方向，那從六朝到晚唐宋初的偉大宗教藝術。這七八百年的佛教藝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佛教彫像。雲岡，龍門，天龍山的石窟，尤以近來被人注意的四川大足造像和甘肅麥積山造像。中國竟有這樣偉大的彫塑藝術，其數量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造詣之高，都足以和希臘彫藝爭輝千古！而這藝術却被唐宋以來的文人畫家所視而不見，就像西洋中古教士對於羅馬郊區的古典藝術熱視無覩。

彫刻之外，在當時（六朝隋唐）更熱鬧，更動人，更炫耀的是彩色的壁畫，而當時畫家的藝術熱情表現於張圖與跋異競賽這段動人的故事：

五代時，張圖，梁人，好丹青，尤長大像，梁龍德間，洛陽廣愛寺沙門義暄，置金幣，邀四方奇筆，畫三門兩壁；時處士跋異，號為絕筆，乃來應募，異方草定畫樣，圖忽立其後曰：「知跋君敏手，固來贊貳。」異方自負，乃笑曰：「願隨，吾曹之友也，豈須贊貳？」圖顧繪右壁，不假朽約，擲管揮寫，倏忽成折腰報事師者，從以三鬼。異乃瞪目跋踏，驚拱而言曰：「子豈非張將軍乎？」圖捉管罵曰：「然。」異雍容而謝曰：「此二壁非異所能也。」遂引退，圖亦不備讓，乃於東壁畫水仙一座，直視四壁報事師者，意思極為高遠。然跋異固為善佛道鬼神稱絕筆畫者，雖被斥於張將軍；後又在福先寺大殿畫護法善神

，方朽約時，忽有一人來，自言姓李，滑台人，有名善畫羅漢，鄉里呼余為李羅漢，當與汝對畫，角其巧拙，異恐如張圖者流，遂固讓西壁與之。異乃竭精神思，意與筆會，吃成一神，侍從嚴毅，而又設色鮮麗。李氏縱觀異畫，覺精妙入神非已所及，遂手足失措。由是異有得色，遂誇託曰：「昔見敗於張將軍，今收捷於李羅漢。」

這真是中國希有的一藝術熱情時代！一因了西域傳來的宗教信仰的刺激及新技術的啓發，中國藝人擺脫了傳統禮教之理智束縛，馳騁他們的幻想，發洩他們的熱力。線條、色彩、形像，無一不飛動奔放，虎虎有生氣。「飛」是他們的精神夢想，飛騰動蕩是那時藝術境界的特徵。

這個燦爛的佛教藝術，在中原本土，因歷代戰亂，及佛教之衰退而被摧毀消滅。高麗的壁畫及其崇高的境界真是一如幻夢如泡影，從衰退透弱的民族心靈裏消滅了。支持畫家藝術的是殘山剩水，孤花片葉。雖具清超之美而乏磅礴的雄圖。天祐中國！在西陲敦煌洞窟裏，竟替我們保留了那千年藝術的燦爛遺影。我們的藝術史可以重新寫了！我們如夢初覺，發現先民的偉力、活力、熱力、想象力。這都是我們現代藝術所缺乏的，也是我們民族生活裏所喪失了的。

這次敦煌藝術研究所辛苦籌備的藝展，雖不能代替我們必需有一次的敦煌之遊，而臨摹的逼真，已經可以讓我們從「一粒沙中窺見一個世界，一朵花中欣賞一個天國」了！

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敦煌壁畫中的極其生動而具有神靈性的動物畫，我們從一些奇禽異獸的潑刺的表現裏透進了世界生命的原始境界，意味幽深雄厚。現代西洋新派畫家厭倦了自然表面的刻畫，企求再由天真原始的心靈去把握自然生命的核心層。德國畫家馬爾克 H. Marc 震驚世俗的「藍馬」，可以同這裏的馬精神相通。而這裏「釋尊本生故事圖錄」的畫風，尤以「遊獵農務」一幅簡直是近代畫家益利盧斯 (H. Roussell) 的特異的孩稚心靈的畫境。幾幅力士像和北魏樂伎像的構圖及用筆，使我們聯想到法國新派 Bonnat 的拙厚的線條及中古教堂玻璃窗上哥提式的畫像。而 Matisse 這些人的線紋也可以在這裏找到他們的偉大光輝。不過這裏的一切是出自古人的原始感覺和內心的迸發，渾樸而天真。而西洋新派畫家是在追尋者失去的天國，是有意識的回到原始意味。

敦煌藝術在中國整個藝術史上的特點與價值是在它的對象以人物為中心，在這方面與希臘相似。但希臘的人體

的境界和這裏有一個顯著的分別。希臘的人像是着重在「體」，一個由皮膚輪廓所包的體積。所以表現得靜穩穩重。而敦煌人像，全是在飛騰的舞姿中（立像、坐像的軀體也是在扭曲的舞姿中）；人像的着重點不在體積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吸力的飛動旋律。所以身體上的主要裝飾不是貼體的彩縐而是飄蕩飛舉的纏繞着的帶紋（在北魏畫裏有全以帶紋代替衣飾的）。佛背的圓光，足下的蓮座，聯合着這許多帶紋組成一幅廣大繁富的旋律，象徵着宇宙節奏，以容包這軀體的膚奏於其中。這是敦煌人像所啓示給我們的中西人物畫的主要區別。只有英國的神祕主義，畫家勃萊克的「神曲」插畫中人物也表現這同樣的上下飛騰的旋律境界。近代彫刻家羅丹也擺脫了希臘古典意境，將人體影像譜入於光的明暗的節奏中，而敦煌人像却係融化在線紋的旋律中。敦煌的藝境是音樂意味的，全以音樂舞蹈為基本情調，「西方淨土變」的天空中還飛躍着各式樂器。

藝展中有唐畫山水數幅，大可以幫助中國山水畫史的探索，令人想像王維的作風。但它們本身也都具有拙厚天真的美。在藝術史上，是各個階段，各個時代一直直接面對着上帝一的，各有各的境界與美，是無所謂進步的。至少我們欣賞者應該拿這個態度去欣賞他們的藝術價值。而我們現代藝術家能從這裏獲得深厚的啓發，鼓舞創造的熱情，是毫無疑義的。

（上接第十面）去，那麼昔日舊歷史中人類在相互關係上以及制度文化上所犯了的錯誤，當必然會明明白白的在已經有了清醒頭腦的現代人眼前呈現出來，根據這一發現，吾人之智慧能力皆必能勝任為今後人類社會找尋出一條不再有着舊錯誤的新的光明大道，大家也便不難在這條新的道路上，去建設合於「真、善、美」的人生。

我們要求生活得堅實美滿，要求能滅除現世的痛苦，只有揭棄舊歷史的黑暗道途，重新另找適宜人類生存的光明大道，在舊歷史的軌跡中，社會是不會有出路，人類也不會有的前途。但是向一個新的方向去努力，却需要我們能首先勇敢的自覺，誠意的求善，然後才能達到。以往我們所遭遇的困難，皆不能視作真正的困難，而真正的困難是在吾人不敢去勇敢的自覺，不願去誠意的求善。人類的頭腦清楚，行為糊塗；有辨別是非好惡的能力，而不實際運用，倒行逆施，糊塗到底，這便是真正的困難，悲哀，和不可救藥了！

所以，肯真心尋求出路，社會便有出路；肯誠意謀求前途，人類便有前途。一切未來的成敗功罪，當視我們現代人審悟覺醒的成度及我們肯為未來所付出的犧牲代價奮鬥努力以為定斷了！

三十七年九月七日南京

